

## 翻譯與新解

廖炳惠\*

打從 1987 起返臺，我一直在清華教後殖民文學與莎士比亞，沒想到二十年之後，卻回到加州大學擔任講座，負責臺灣與亞洲的文學、影視課程，教材與授課語言整個都得以英文為準，比較翻譯研究因此變成日常活動。

也是在這個新的環境及其條件、需求之下，我發現到不少英譯本與漢學或東亞研究者的問題，尤其他們強為遠古、生疏、異文化加註、予以現代社會脈絡化的同時，往往只專注於運用近便的類對等 (quasi- or para-equivalent) 辭彙、例子，而忽視了歷史、文化差異及諸多不可翻譯的面向，以致有所失誤，如把「王遇之無禮」(《燕丹子》) 譯作：“ill-treated”，忘了「禮」其實有國際政治、外交、儀式、宗教、音樂、言行規範的意涵，在故事裡，不僅秦王無禮，燕太子丹更對太師、田廣、含冤投靠的樊將軍等失禮，而荊軻也顯得矯作、怠慢，進而因為過於自恃，乃錯失良機，導致燕、魏亡國。其它例子，如：將「十里之外，不辨人馬」的地理、心理、物理的距離與混亂譯作「十步」(《中山狼》)，把「饅頭」當作「餃子」(《雷峰塔》)，造成誤譯。

此處，所謂的「近便」、「類對等」，不僅是比較文學的類比 (parallel)、媒合或人為複製的「擬仿」(simulacra) 及「假借」(prosthetics)，其實更是指向漢學家隱而不顯的意圖，乃是要去服務原典 (或中國及其博大精深的奧祕)，英譯只是一個方便法門，透過相當、神似的類對等方式 (approximation，如以 “knight” 或 “swordsmen” 去對譯「俠」)，嘗試去靠攏、親近作品，但終究無法完全與原文處於相同的地位。果真要去玩味、細品，只能研讀原典，變中國通才行。因此，漢學界通行的說法是張愛玲的中文之美就連作者本尊也無法將之譯為英文，或者，以另一種角度來詮釋，張氏在美國 40 年的「無成」，即在她不斷的自我翻譯，終歸徒勞地緬懷她的上海。換句話說，翻譯總是從屬於原文之下，無法達到創作的位階。

---

\*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教授

問題是：張愛玲的「自我翻譯」其實是創作，人物、情節、性別與人際關係都在她的電影腳本、英譯小說中大幅改寫，不但受到好萊塢浪漫喜劇的影響，並且運用了多媒體、新思想或倫理觀點。她的後半生其實是「無以翻譯」(untranslatability)的一大印證。她一方面回拒英文對等的表達；另外，更在自己過去的作品裡挖掘其中尚未發展的成分，讓它們得以在另一語境中獲致新生(afterlife)與未來。

目前，隨著網路搜尋、雲端運算、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等技術的高度擴張，「類對等」的翻譯儼然更具足了科學、大數據的基礎。透過排比、統計的處理方式，我們馬上可找到一系列的對譯選項，而且是多語文，十分近便。然而，2020年6月中旬的《經濟學人》在人工智慧的專門報導裡，卻分析了各種困難及窘境，不但無人駕駛的自動車碰到瓶頸，機器學習與翻譯的程式及其內容都需要更多的人力去檢驗、訂正、修改。大企業因此紛紛喊停，似乎人工智慧的「秋天已經來臨」，而夏季熱潮正在淡出。

其實，從生技的轉譯醫學，強調基因、環境、歷史等變數對精準、個別化醫療的作用，到藥物的預期之外新用途(repurposing，例如藍色藥丸本是心臟藥，或類固醇可救 COVID-19 的病危者)，以至於新綜合生物學、深度營養學，以及各種神經、認知、政經、環境、醫療人類學等等的研究，都顯示出：翻譯是要面對無以找尋「類對等」的挑戰，必需去重新思考「無法對譯」的問題，同時它也必然要跨學科、創新、整合。

最近有幾本書均以「無以翻譯」為翻譯研究論述的主軸，並提出翻譯的倫理與政治問題，例如：Henri Meschonnic 著 *Eth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ng*、Lawrence Venuti 著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這些學者均主張翻譯是要道出原典所未能道，力圖開創新的意義脈絡，以便揭示文本在另一個語言世界的既起及基進潛能，對其他人類的未來產生影響。也就是說，翻譯並非要以文法、語意學的統計為準的對等、複製活動，而是在對象語言及其文化中「發現或發明」新的表達，將原文想說出的傳釋到另一個語境，其中的一大選項包涵保留原文的音譯或引用(citation)，例如，英文的“kongfu”(功夫)、“kawaii”(並不只是cute而已)，或中文的「巴士」、「哀鳳」(I-Phone)等，但大致有更多的情況，則是創發新意，一方面替原文找到新的聯結，另外，是要擴充傳統辭語的意涵，讓它們富於語意表達的除舊布新(semantic innovations)，成為活生的比喻。

準此，Venuti 即說「翻譯改變了一切」，不只對原文產生質變，也在譯文的閱讀社群裡，造就新知識或世界觀。在跨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中，如果我們以

日本或中國透過翻譯西洋文獻，去推動、運轉現代化的科學、富國強兵政策，即可歸納出翻譯對國家未來的貢獻。當然，翻譯也勢必與國際關係及其權力糾紛密不可分，條約上的主客認定往往富於詮釋、再譯的空間。

這些重要的翻譯學者均提到倫理與政治的面向，但卻沒深入演繹。我認為 Giorgio Agamben 在其鉅著 *Homo Sacer*，尤其最後一冊，有關 bio 作為複製、勞動、經濟、能量、生理、身體的基準，進而發展政治潛能、統轄、影響等的見解，其實有相當的啟發性。如果我們以 Agamben 的「哲學的考掘學」為思考框架，再回到文章開始提出的問題，也許可理解到《燕丹子》及《中山狼》如何建構其繁複的文本，荊軻喧賓奪主，凸顯了燕太子的短視、無能，而故事形成於漢朝，面對刺客備受司馬遷的歌誦，匹夫亦可弑君，可歌可泣，但同時儒家儀禮已成為國家獨尊的正典，何以定位上下、尊卑、禮節，尤其涉及跨國的外交與安危？「遇之無禮」因此有重大意涵，絕對不是 abuse 而已。至於《中山狼》，是否可能受到《伊索寓言》或新約聖經及傳教士證道故事的翻譯影響，還是僅為作者馬中錫的不平之作，代友人出氣？地理位置的錯亂，與人狼的主客易位及最終的審判，有著密切關係，距離的拿捏與是非判斷應都是大關鍵，正如目前中國的外交「戰狼」在海外紛紛變成「孤狼」，其政治倫理與跨文化的翻譯意涵值得斟酌、玩味。